

江都地名中的淮扬文化元素

张进 陈雪飞

淮扬文化,是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,是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范围的区域文化,包括今江苏、安徽二省的江北部分,“具有崇教尚文、清秀优雅、豪迈超俊、宽容大度的文化性格和博大精深、兼容南北、雅俗共赏、刚柔相济的人文精神。”江都地处江苏北部,是苏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,江都的历史,是得水之灵性、蕴含淮扬文化精髓的历史。地名,是了解地方风俗文化的重要窗口。研究江都地名,不仅拓展地区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的研究,更有助于对淮扬文化特征的了解。

烟波水世界,逆浪弄潮人——江都地名的“水韵”

水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源泉。特殊的“水”地理环境,不仅给江都的发展带来独特的优势,也为江都地名的产生、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
江都地处里下河平原,境内湖泊密布、水网密集。江都618个行政村地名中,与“水”有关的通名分布如下:以“河”为通名的有26个,占总数4.2%;以“荡”为通名的有7个,占总数1.1%;以“湾”为通名的共4个,占总数0.6%;以“塘”为通名的有6个,占总数1%;以“滩”为通名的有2个,分别是仙女镇的外滩和浦头镇的袁滩;以“荡”为通名的有7个。也有以“川”“沟”为通名的,如樊川、丁沟。

有水,便有“桥”“港”“浦”“渡”等出行渠道,也催生了相应的地名:以“桥”为通名的有36个,占总数5.8%;以“港”为通名的有9个,占总数1.5%。此外,还有浦头、郭家渡等以“浦”“渡”为通名命名的地名。“江”“河”“沟”“滩”,是对地理特征的描述,准确地反映了江都的自然风貌。

作为一座水城共生的城市,水滋养出清新、柔美、鲜活、浪漫的水文化。然而江都的水文化并非仅仅“柔雅”,江都人自古以来豪气干云、逆浪弄潮的雄健气概,也应是水文化题中应有之义。

水,滋养了江都,但也带来了“水患”。江都的历史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治水的历史。如今,江都地区“圩”“坝”“闸”等水利工程比比皆是,如江都水利枢纽工程、邵伯埭、万福闸等,这些水利工程周围区域,多以“圩”“坝”“闸”命名,如樊川镇的老圩、新圩、阳圩及仙女镇的太平圩等;浦头镇的胡坝、仙女镇的李坝、田坝等;仙女镇的七闸、吴桥镇的许闸等。地名通名用“圩”“坝”“闸”,既是对治水盛举的铭记,也是对江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,不断改造自然、利用自然的感念。

江都地处里下河洼地,境内川泽纵横。人们挖塘堆土成垛,垛上种植芋头、红薯、花生、小麦、油菜等,河渠沟塘中养鱼,也种植荷、菱等水生植物。垛田始于宋元,盛于明清。目前,江都以“垛”为通名,有“华垛”“颜垛”两处。江都物产丰富,不同地区物产也有不同,独特的地方物产也催生了一批独特的地名。花荡位于江都南部,原为沼泽滩涂,由于土地肥沃,百姓便在荡畔湖边种花栽树,并以此为生,故名“花荡”。类似得名还有苻丝、竹墩等。

“汉语姓氏地名,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,最高的80%,最低的也有15%,一般约在

功业刊燕石,沧桑名中留——江都地名的“史话”

刘濞建国,景帝建县,开启江都建置发展历史。江都许多地名的命名,与历史事件有直接关联,研究这些地名,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,对于研究江都地方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江都自古人杰地灵,把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事情加在地名上,不仅增添了江都地名的历史风韵,也是一种缅怀先贤的方式。

东汉名臣广陵太守张纲重视生产,访问疾苦,后卒于任上。百姓感叹“千秋万岁,何时复见此君”,遂将“张网沟”改为“张纲”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谢安曾出镇广陵,带领百姓修筑水利设施“埭”,造福人民。民皆称颂,将其比作召公,尊其为“召伯”。今天的邵伯即源于此。宜陵,汉时称“东陵”,隋炀帝下江南之时,宠妃宜妃客死此地并归葬于此,自此东陵改作宜陵,至今仍沿用。真武原为“玄武”,清圣祖康熙名玄烨,为避讳改为“真武”。其它因历史人物得名的,如曹王因北宋名将曹彬得名,小纪镇是为纪念无偿摆渡的纪姓摆渡者得名,昌松是为纪

念革命烈士史昌勋和卞松山得名,等等。

夏兆麟曾说:“村舍之名,如龙开声、羊打鼓,皆极诡异,莫之所知。”其实,许多地名渊源与历史事件有关。据《宋史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及各版《江都县志》记载,岳飞曾率大军在此驻扎。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名将岳飞利用郭家村遍地皆沙的特点,采取“卧马嘶声,悬羊打鼓”策略大败金兵。后来人们将郭家村改为嘶马。现在嘶马北有“马场”,乃当年岳家军养马所在;南有“船窝”,乃造船所在;西有“烟墩口”,是岳家军水军驻地及沿江烽火报警所在;东有“柴墟”,乃当年战场所,在,史书有“日战柴墟,夜宿海陵”的记载。今泰州姜堰仍有以“羊打鼓”为地名。岳家军不扰民,民得以安,为纪念岳飞,人们将岳飞大营驻扎之地称为“麾村”,其他地方以“营”命名。据统计,江都地区以“营”字为通名者共13个,占总数2.1%,如丁沟镇麾村一带的朱家营、顾家营等。英雄已去,但“向来戎马志,辛苦为中华”的抗击强敌、精忠报国精神,闪耀着璀璨中华文化光

辉,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。其它因历史事件而得名的,如杨庄与姑苏名将杨兆熊在此地剿匪有关,黄思与明代反对魏忠贤的江都义士有关,昭关与伍子胥闯昭关有关。

江都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通道,民众迁徙,衣冠避难,多聚集于此。南宋人陈造《邵伯阻风小泊,赠送行诸公》诗云:“船阁雁鹜洲,人穿鱼虾市。相逢各吴语,知识十三四。”邵伯是当时扬州重镇,一句“相逢各吴语”,可见在北宋中期有不少南方移民聚集在邵伯附近。“洪武赶散”,强制迁徙苏州地区人民填充淮扬两府。据黄继林测算,明初,扬州府徙入苏州移民220850人。明代于若瀛《扬州府志序》说,扬州乃水国,扬州一带是四方移民集聚之地,土著只占移民的1/20。移民聚居,也带来地名的变化。谢桥位于白塔河中段,现属吴桥镇。谢桥有两大望族,即谢氏和王氏。据谢桥王家族谱记载,王家祖籍苏州,洪武年间奉命迁扬州,在城东四十里郊外(今谢桥)居住。而谢氏乃洪武六年(1373年)由苏州迁扬州,居住在谢家湾。二姜

也是姜氏由苏州迁移至江都而得名。二姜有一大一小两个姜庄,东边叫大姜庄,西边叫小姜庄,明清几百年间,两个姜庄其实分属不同的县,大姜庄属于泰县(今泰州),小姜庄属江都县,抗日战争期间,为方便领导,才将大小姜庄合二为一,均属江都,并称“二姜”。吴桥、高汉、吴堡居民也多是苏州移民后代,得名过程与谢桥、二姜大同小异。有唐一代,江都经济繁荣,商贾云集,胡商众多。胡商是指从波斯、阿拉伯经过广州,或由丝绸之路经长安来扬州,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人。胡商的到来,不仅为江都带来了异域文化,也催生一批新的地名。其中就有“波斯”。“波斯”现属大桥镇,位于长江以北,原名樺树阁,在唐代是水上丝绸之路的要道,包括波斯在内的各国商人络绎不绝。其中有一位波斯人在此地定居,后来有土匪劫掠樺树阁,这位波斯人率领乡民与土匪搏斗,结果壮烈牺牲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波斯人,将樺树阁改为“波斯庄”。这些都表明,波斯村隐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锦绣淮扬地,风俗淳朴情——江都地名的“风情”

30%—50%之间。”江都地区亦然,姓氏地名初步统计有224个,占总数37%左右。江都姓氏地名主要形式为:姓氏+(家)+庄、村、套、桥、楼、堡。就姓氏而言,有单姓命名和姓氏复合两类,其中又以单姓命名最为常见,如杨(家)庄、李(家)庄、郭(家)村之类。俱姓乃波斯人后裔,部分人甚至称自己的姓氏读音为lǐ,而非汉姓nài。至于“姓氏+姓氏”复合的命名方式,数量不多,有朱陈、姜黄、韦高、张倪等。这些地名得名于两个居民姓氏的复合,两个姓氏宗族可能

是此地最早的开发者、发现者,或是人口最多、香火最盛的姓氏,亦或是财力最丰、出力最多的宗族。还有将姓氏后置,姓氏前加数量词、方位词的,如二姜、北李、南荀等。

地名是心愿的航标,引导人们追寻心中梦想。在江都地区,祈愿地名多取“吉”“祥”“丰”“富”“福”“寿”和“安”“旺”“兴”等,如万年、幸福、延寿、丰乐、恒丰、长丰等。龙是中华民族图腾,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,象征高贵、吉祥、幸福。江都以龙命名的地名特别多,如武坚

镇有村名龙耳,村内有龙河、龙东;吴堡有龙港村(原名龙耳),龙港村有龙耳湾;郭村镇龙桥村原本也被称为龙耳;锦西延寿村有龙尾沟(组);仙女镇有九龙村,因九龙口而得名;三周李楼有小龙庄,永安老圩有龙家圩。这些地方皆因龙而得名。同龙一样,凤凰也是吉祥的象征。在邵伯镇有村名叫“凤凰”,丁伙镇有“新凤”,永安镇有“里凤”,都与凤凰的传说有关,均寓意吉祥安康。

江都,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苏中明珠,以其灼灼光华熠

耀神州大地。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,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,也丰富了精神生活。两千多年来,江都地区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,并遗留了众多的历史遗迹,成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。滔滔运河水,展现江都的“水韵”“风情”,诉说江都“史话”,蕴藉江淮文化风韵。江都的地域文脉,特有的民俗文化,也通过重要窗口——地名得以展现。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,对江都地方地名的分析研究,有助于江都地名文化遗产、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,有利于推动淮扬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。